

## 马来亚华社国语运动中的“马来语文斗士” ——以《马来语月刊》为个案

吴小保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 摘要

《马来语月刊》创刊于1960年，这是一本由华人资本出版的马来语学习刊物。《马来语月刊》的创办与上世纪50年代在马来亚与新加坡华社掀起的学习马来语（国语）运动有关，其目的是配合独立建国，华社积极推广马来语文的学习与使用，创造一个新兴的马来亚民族。本文将以此《马来语月刊》为个案，分析该刊物在华社学习国语运动中的特殊历史意义。本文将指出，《马来语月刊》在国语运动史中的定位是马来文斗士（Pejuang Bahasa Melayu），而非被动的“学习者”。其次，《马来语月刊》对华人与马来人的文化交流，无论是语言推广、翻译、创作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内外条件的改变，国语运动失去了其在华社的群众基础，《马来语月刊》也不得不在1970年代宣告停刊。

**关键词：**马来亚、国语运动、华人、《马来语月刊》

## **“Pejuang Bahasa Melayu” from the Malayan Chinese’s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A Case Study on *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

GOH Siew Poh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 **Abstract**

*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 was a monthly magazine first published in 1960 by the Malayan Chinese community. The objectives of *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 were to promote Bahasa Kebangsaan (Malay) in Chinese community, and to create a new Malayan national ident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 at the time when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was going strong in Chinese commun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 should be positioned as “Pejuang Bahasa Melayu” (fighter of Malay Language) rather than a passive follower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Secondly, since its foundation, *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 had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Malay culture. However, due to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atmosphere since 1960s,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has gradually lost their supports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result of this change has eventually led the publication of *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 to stop in the 1970s.

**Keywords:** Malaya,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Chinese, *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

## 一、前言

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宪法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sup>1</sup>两年后，新加坡取得自治，为争取与马来亚合并，大力推动马来语为国语的政策。<sup>2</sup>由于公权力的介入，促使原本逐渐被边缘化，并且缺乏现代知识与经济价值的马来语，地位一时水涨船高。另一方面，在反殖民、独立建国的时代号召下，许多人积极参与到民族主义运动中，主张建立马来亚民族。学习与使用马来语被人们视为能够促进各不同族群的了解，从而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马来语也因此在1950、60年代成为马新两地华社积极学习的语言。

在积极学习国语的这段期间，华社出现了一份华马双语的刊物《马来语月刊》(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尽管从当地华人出版史角度看，双语刊物并非史无前例。例如早年峇峇华人就曾创办过至少三份华英双语的日报、杂志，以及一份华马双语的报纸。<sup>3</sup>但与过去的双语刊物最大区别在于，《马来语月刊》是一份有着明确的马来亚民族理念的刊物，其所服务的对象虽然主要是以华人为主，但其目的却是要促进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族群的大团结，创造一个以国语为主的沟通共同体。

《马来语月刊》的出版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这是一份由华人资本创办的、面向一般大众的马来语文学学习杂志，当时市面上另一份语文杂志是上海书局出版的《国语月刊》(Bulan Bahasa Kebangsaan)，但这份杂志的寿命只有三年；相对于此，《马来语月刊》则维持了十一年。其次，这份杂志的编辑团队跨越族群界限，包含了华人与马来人。其三，这份杂志在十一年的出版中，积累了相当程度的华马文化交流资本，其中包括译介作品、语文知识推广等。最后，这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语文学习杂志，在往后随着推广国语工作的进展，《马来语月刊》尝试发挥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尽管其政治影响力可能并不大。本文将针对这四个面向，探讨《马来语月刊》在华社学习国语运动史中的特殊意义与作用。

---

<sup>1</sup> 根据马来亚联邦宪法第152条(一)联合邦之国家语文为马来语，其字体应由国会以法律规定之。并附上两款限制：a) 任何人不得被禁止或阻止其使用(官方用途除外)、教授或学习其他语文，且b) 本款不妨碍联邦政府或任何州政府保存并扶持联合邦其他种族语文之使用与研究。第152条的其他款项则提到在独立日十年内或再后期间，直到国会另行规定为止，英语在联合邦内官方的各种用途。参见《马来亚联邦宪法》(1958)。

<sup>2</sup> 为了与马来亚合并、统一，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纲第十一项承认马来人的特殊地位，保护促进他们的利益，并鼓励人们学习马来文。1963年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共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联合邦宪法》第152条款延续《马来亚联合邦宪法》之规定，以马来语为国语，并保障其他语言在官方用途以外的使用权益。1965年马新分家，新加坡成为独立共和国，继续以马来语为国语，华、马、印、英语则为官方语文。参《新加坡一百五十年》(1969)。

<sup>3</sup> 即Straits Chinese Herald/Surat Khabar Peranakan (1894/1/22-5/7)、The Friend of Babas (1906/7-1908)和Kabar Slalu/Daily News (1924/1/5-1924/5/16)。这三份刊物分别是日报、杂志和周报。至于华马双语杂志则是Perdagangan/《商业报》(1928-?)。相关峇峇人创办的报刊，参考自黄慧敏(2004)。

## 二、《马来语月刊》的创办、理念与编辑

### (一) 时代背景与宗旨

1960年1月20日，《马来语月刊》创刊，这份由马来文化促进机构（Pengusaha Perkembangan Persuratan Melayu）出版的华马双语刊物，来自华人资本，此机构隶属于星洲世界书局，其老板是周曾钧。《马来语月刊》是个小开本刊物，共42页，创刊号内页以马来文注明“majallah untuk memperkembangkan bahasa kebangsaan”（一本推广国语的杂志），表明其创刊理念。

此刊物当时由著名马华作家鲁白野（Lu Po-yeh）与马来作家 Abdullah Hussain 联合主编。自1960年创刊后，经历了三位主编之手，至1970年出版第110期才画上句号。

《马来语月刊》的创办，是配合当时马来亚与新加坡华社学习国语运动的热潮。<sup>4</sup>1950、60年代马来亚华社掀起了一股学习国语运动，此运动在华社的主要推动者是一批掌握华语与马来语的知识分子，当中许多来自南洋大学的学生。南大创办于1956年新加坡，是当时中国以外唯一的民办华文大学，南大生当时积极响应建国呼吁，在大学初创期间就对马来语文表现浓厚兴趣。他们除了开办马来文班，也从事创作、翻译、编纂词典等工作。在南大以外，各大书局也积极投入资源于推广马来语学习的出版工作中，其中星洲世界书局与上海书局的贡献最大（杨贵谊2005）。彼时马新华社出版了大量的单语、双语或三语的读物。杂志方面，如南大生创办的马来文版 Mimbar Universiti（大学论坛）、Budaya（文化）、《马来语月刊》、《国语月刊》等；大部分刊物维持不久，《马来语月刊》能够出版十一年，无疑是个异数。当时出版的其他书籍，包括翻译著作，如《刀尖下的生命》（丁娜译）、《为祖国立功》（杨贵谊译）、《一个女人之死》（拉迪译）、《爱情与战争》（堂勇译）等。还有其他关于马来习俗与语言的著述，如《马来人风俗》（梅井编）、《马来亚的兄弟民族》（梅井著）、《简明马华词典》（林焕文编）、《实用马华英大词典》（鲁白野编）等。从以上概述看，当时华社知识分子积极地吸纳本土文化资源，以便促进各族群的了解、和谐共处与团结。

《马来语月刊》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创办。创刊主编鲁白野对此时代氛围相当敏锐，发刊词即分析道，当时华社掀起学习国语热潮与三件事相关。首先是1956年第三届马来语文大会（Kongres Bahasa dan Persuratan Melayu Malaya）提出了“言语是民族的生命”（Bahasa Jiwa Bangsa）口号。其次，自马来亚独立后，马来语被宪法规定为国语。最后，李光耀为主的新加坡自治政府积极提倡学习国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来语月刊》表示：“本刊同仁忝为国民一份子，对提倡学习国语运动自认应负起一部分责任，一分热，发一分光，乃决定出版

<sup>4</sup> 关于当时华社学习国语状况的研究，可参考杨贵谊（2000，2006，2014）、庄华兴（2004，2008）、吴小保（2016）等。

《马来语月刊》，以适应这大时代的要求。”（《马来语月刊》，1960，页3）为此，《马来语月刊》设定了两个宗旨：首先，帮助华人学习国语。其次，促进华人与马来人的交流。

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马来语月刊》开辟了很多跟语言知识有关的栏目。如“单词与说话”（Latehan Tutor-kata）、“马来书信”（Surat-menyurat）、“新闻天地”（Warta Berita）等。这部分内容主要符合第一项宗旨，即“帮助华人学习国语”。除了日常实用的语言知识，在文学文化领域的创作与评论的译介方面，亦做了相当的工作，包括发表马来青年诗人 A.S. Amin 的诗歌、学者 Ismail Hussein 的文学批评稿等。这部分主要是符合第二项“促进华人与马来人的交流”宗旨。尽管往后《马来语月刊》更换编辑，这两大宗旨基本没有改变。

## （二）编辑团队

自1960年创刊后，《马来语月刊》共经过三个主编之手。最早由鲁白野与 Abdullah Hussain 合作，在编到第17期，鲁白野因病逝世，停刊若干月后，世界书局老板周曾钧邀请精通马来语文的南大毕业生杨贵谊帮忙，但后者正准备赴往印尼深造，只好委托南大校友 Low Hang（刘汉，原名刘正朝）接手。因担心刘正朝能力不足，杨贵谊邀请 Ting Noh（丁娜，原名陈妙华）从旁协助。刘正朝在接手后，编务不顺，月刊变成双月刊，在编了18、19和20期后辞退。《马来语月刊》转由陈妙华接手。陈妙华在获得杨贵谊协助下，从1962年开始担任《马来语月刊》主编，直至1970年4月20日第110期停刊为止（陈妙华，2005）。在这过程中，Abdullah Hussain 一直在杂志上署名为联合编辑。

根据 Abdullah Hussain 的回忆，1960年代他认识了一位在《星洲日报》担任编辑的华裔青年 Lee Hwa（即鲁白野），后者邀请他担任《马来语月刊》联合编辑。尽管挂上名字，并且曾学习过简单的中文，Abdullah Hussain 并没有实际参与编务，组稿、写稿、构思都是鲁白野全权处理。在稿件完成后，鲁白野会寄一份马来文的校样本给他过目，并在获得他同意之后，稿件才允许刊登（Abdullah Hussain, 1984, 页344）。因此，可以这么说，在鲁白野主编时代，《马来语月刊》至少从形式上来说，是一本华人与马来人合编的双语杂志，尽管 Abdullah Hussain 基本上并未扮演积极角色，但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然而，自第17期鲁白野去世后，接手的刘正朝与陈妙华虽然继续把 Abdullah Hussain 名字挂在《马来语月刊》，但不再发校样本给他过目。Abdullah Hussain 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还挂在杂志上，他是在多年后才发现此事。<sup>5</sup>综合以上，Abdullah Hussain 在鲁白野主编时期并未扮演吃重的关键角色，而在鲁白野逝世后，则在未知情下继续挂名。虽然如此，Abdullah Hussain 的存在却还是有一定

<sup>5</sup> 根据陈妙华回忆，由于鲁白野突然逝世，许多事情并未交代。Abdullah Hussain 名字从第一期开始就挂着，因此她接手后也照样放着，本身在编杂志时并未与对方有任何编务上的往来。笔者与陈妙华的访谈。2017年6月16日，新加坡。

的意义。尤其从《马来语月刊》第二项宗旨来看，即“促进华人与马来人的交流”；尽管其意义主要局限在象征层面。

实际上，在鲁白野主编时期，相当重视马来人的稿件，曾刊登诗人 A.S. Amin 专为《马来语月刊》创作的诗歌〈野孩子 Nakal-nya Sa-orang Anak〉（第 1 期），也曾获得几位马来文学界重要作家来函鼓励和指正，如 Harun Aminurrashid, A. Samad Said 等。

除了邀请马来作家助阵（但比例上不多），《马来语月刊》也获得当时掌握华马双语的华裔知识分子的定期供稿。例如、李全寿、谷衣（即廖建裕）、杨夷、马岂（皆是杨贵谊）、林清吉等，这几位都是南大生或南大讲师，是当时新加坡重要的华裔马来语文工作者，从事马来语文教学、翻译、创作、研究、词典编撰等工作。因此，《马来语月刊》可说汇聚了一批当时重要的作家。除了邀稿，《马来语月刊》也接受马来亚、新加坡各地读者的投稿。为了鼓励大家学习、使用马来语，编者都会尽量刊登。<sup>6</sup>

### （三）语言理念

《马来语月刊》提倡马来语的学习与使用，但不主张华人放弃本身的语言。该刊第二期刊登了 Ismail Ahmad 的〈必须拆毁言语的壁障 Tembok Bahasa Harus Di-hapuskan〉，该文主张双语之间的互译是必要的，因为可以透过文学让人们了解对方。然而，该文接下来却指出，虽然翻译是个重要机制，却不是解决语言带来的障碍的长久之计。Ismail Ahmad 因此认为，要解决此问题，必须全面推广国语，并创造一个单一语言的文化与文学。当时主编鲁白野不同意 Ismail Ahmad 的观点，在同一期的〈编后话〉做简短回应：

我国是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国家。在本期发表的 Ismail Ahmad 的评论〈必须拆毁言语的壁障〉，就是论我国已发生的语言问题。在建立马来亚文化的这个最初阶段，有些人认为，马来亚文化就是马来文化，不必再浪费时间与笔墨去理论。有些人则以为，言语与文字不过是传达人类思想的媒介，换句话说，马来亚文化是侧重质的方面之建设，即侧重灌输对马来亚效忠的爱国思想。至于语言与文字，不过是形式的问题。在我国全民拥护以马来语为国语的大前提下，各族应该仍可用其母语与文字创作的。

（《马来语月刊》，1960，页42）

由此可见，创刊主编鲁白野反对 Ismail Ahmad 的单一语言观点，追求多元语言的社会图景。《马来语月刊》往后的编辑，如陈妙华等人，基本上都延续这条路径前进，追求多语社会的理念。譬如代表刊物立场的“编者的话”就曾发

---

<sup>6</sup> 《马来语月刊》的用稿原则是以外稿为主。“虽然本刊各样的版面有限，但我们处理稿件的原则是：先考虑外稿；在不抵触本刊内容的要求和水准之下，我们尽可能给外稿发表的机会。”引自〈请批评，多赐稿〉（第30期，页 42）。

表“Langkah Yang D-perlukan”（第55期），表示欢迎国家语文局成立华文和淡米尔文出版部的计划，认为这会提高马译华的工作。然而，随着这计划只闻楼听声，却没有实际行动，《马来语月刊》又发表“Ranchangan Baru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第85期），批评国家语文局缺乏行动力。故此，我们可以说，就多语社会的大方向来看，《马来语月刊》的立场是跟当时主流华社是一致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特别是在陈妙华主编时期，在针对华语是否该列为官方语文一事，他们却与当时大部分华人持不同立场。

当时马来亚华社虽然接受马来语为国语，却与马来人的理念有着相当差异。1950年代起，在马来亚踏上自治、独立之路上，政府开始整合国民教育体系。华文教育的存亡成为当时重要的议题。马来人语文精英的主张是放弃多源流教育，改为单一源流，所有学校统一以国语为教学媒介语。如此一来，也意味着华文教育的消亡。基于此，华社发起捍卫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学校行政语与考试语的华教运动。华教运动并不反对以马来语为国语，仅仅不同意马来语取得国语地位后导致其他语言的边缘化。从1950年代起，华教运动领导人林连玉就萌生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的构想，希望透过这个方式保住华文教育的完整性。而此构想转换为具体的运动，则是在1960年代中沈慕羽领导的华语官化运动（郑良树，2003）。换言之，华教运动实际上认同马来人语文精英主导下的国语运动的一部分主张，即以马来语为国语，却反对把马来语规定为唯一官方语文，而主张多语官方语文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左翼华人（主要是受华文教育者）也积极响应华语官化运动，发动争取华文与淡米尔文为官方语文的诉求。1966年10月24日，马来亚劳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坚决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明确提出这项主张。在文告发出后，却意外地遭到雪兰莪州人民党、星加坡社阵等其他左派团体的批评，认为“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口号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正确的口号应是“争取各民族语文一律平等”。随着争论进一步发展，左翼华人内部，有部分人发展出“反国语论述”，他们所反对的不是“马来语作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的政策，而是反对“国语”、“官方语文”这个概念本身，因为这些概念违背了平等主义原则，并尝试以“普通话”替代之（吴小保，2016）。

在华社，除了以上的“华教运动”（马来语为国语，多语官方语文）与“反国语论述”（反对设立国语和官方语文）两种立场外，还有第三种立场，他们基本上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但他们与马来人语文精英的想法还是有细微差异，即认为华语在公领域，应该还享有学习与使用的权利。因此，他们反对单一源流教育方案。《马来语月刊》就持这种立场。举个例子，为了迎接1967年马来语即将成为唯一官方语文的大限到来前，《马来语月刊》多次在杂志上呼吁华社应该学好马来文。例如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Memang Sudah Pada Tempat-nya”（第53期）、“Selamat Tahun Baru”（第70期）、“Menjelang 1 September”（第78期）等评论文章。很显然，这样的立场与前述在华社兴起的“华教运动”与“反国语论述”并不相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关键在于对“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的认知差异。对“反国语论述”人士而言，国语、官方语文本身就违背平等主义，因此不可能接受它。对华教分子而言，争取列华语为官方语文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华教的完整性。反过来说，未能被列为官方语文，被认为是华语/华教失势的根源。然而，对《马来语月刊》编辑部来说，“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并不会危害其他语文的存亡。例如，第55期有读者投稿询问“唯一官方语文推行后，其他语文是否能存在？”编者在〈唯一官方语文的疑问〉中回答：“依宪法规定，其他语文将获得自由发展。”（《马来语月刊》，1964，页40）

### 三、马来亚民族主义者：鲁白野、陈妙华与杨贵谊

如前所述，1950、60年底，马来亚掀起反殖民、争取独立运动，在语言文化领域，则发起了学习国语运动。学习国语运动主要的推动力，除了来自国家层面的力量，例如在宪法上规定马来语为国语，规定政府公务员必须具备特定马来语文资格、官方文件使用马来文，也举办各种推广活动如国语月、国语周等。此外，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亦是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在当时，华社知识分子普遍上认为，马来亚化不等同于马来人化，但这不表示华人应该否定马来人文化。反之，他们积极地吸纳马来文化，这包括了语言、文学、文化与历史等各方面。下文将针对参与《马来语月刊》编辑与出版事务的三个重要人物，分别是鲁白野、陈妙华与杨贵谊，探讨他们的马来亚民族理念的形成。

#### （一）鲁白野

鲁白野本名李学敏，其他笔名包括威北华、楼文牧、越子耕等。1923年生于霹雳州怡保。日治时期逗留在印尼并结识印尼重要文人，如 Khairil Anwar。战后重返新加坡，并响应独立建国的号召，投入到国家文化的建设工作中，这包括了马华文学的创作、普及化南洋研究与推广马来文，并以各种笔名出版了《狮城散记》（1953）、《马来散记》（1954）、《马来散记续集》（1954）、《春耕》（1955）、《流星》（1955）、《马来民族的诗》（1957）、《马来亚》（1958）、《实用马华英大辞典》（1959）等书。自1960年起担任《马来语月刊》和《星洲日报》马来文副刊《国语周刊》主编。

鲁白野的国家认同曾经历过一个转折。从印尼重返新加坡后，起初几年他如同其他当地人一样，自认是华侨，视中文为国语，中国为祖国。例如他曾写道：“他（按林文庆）虽然是个侨生，却从来不会像别个侨生一样蔑视祖国文化，相反地，他还能在工余拨冗致力推展国语教育及发展孔子学说……”（鲁白野，1953，页21）文中的“祖国”和“国语”都是指“中国”和“华语”。直至1950年代中期以后，鲁白野才开始转向，“我国”变成“马来亚”、“国语”则是“马来文”。

鲁白野拥有峇峇血统，他曾提到自己的祖母是一名娘惹（鲁白野，1953，页24-89）。因此可以推断自小就掌握一定的峇峇马来语。他曾在一篇文章提到，他学习马来文的第一本课本是文西·鸭都拉的《鸭都拉自传》（鲁白野，1954，页166）。有理由相信，鲁白野是在印尼期间或之前就掌握比较高阶的马来语文能力，因为他在印尼期间曾参与印尼文学的活动，并认识了著名诗人Khairil Anwar。

早在印尼时期，鲁白野已经意识到华人学习马来语文的重要性，在后来出版的《实用马华英大辞典》的〈序〉，他指出：“本辞典的出版，是编者十多年来在做美梦的实现。最先向我提议编辑这部辞典的挚友K安华今已长眠爪哇岛的荒原上。人生沧海桑田，有时回想起来，未免要感慨万分。”（鲁白野，1959，页1）

在1953年出版的《狮城散记》，鲁白野也曾透露希望自己可以有个安定生活，专心编一本马华词典，并指出：“在马来亚，华侨人数虽占全国人口的四十巴仙，精通马来语的人数却是寥寥无几，实在比不上印尼华侨的努力了。我们如果诚恳地认为中马两大民族间的隔阂及歧视必须消弭，我们首先就应该学习马来语，这是沟通两大民族的友谊及亲密合作的最佳的桥梁。”（鲁白野，1953，页67）

因此，可以说，在转向认同马来亚前，鲁白野已经意识到华人或华侨学习马来语文的重要性。然而必须指出，在一开始，其意欲推广马来语文的目的，是站在“中马两大民族”，而非站在共同的“马来亚民族”立场出发。但是，随着马来亚独立、新加坡自治，推广马来语的目的，就变成建构“马来亚民族”。

## （二）陈妙华

陈妙华于中国出生，十岁时随母亲从汕头搭船南下寻父，先到曼谷，然后再由父亲的一位同乡带到吉隆坡。1950年代初，因家庭纠纷，乃随母亲辗转来到新加坡定居。1950年代中期，陈妙华就读南洋女中，彼时中学生运动兴起，引来殖民地政府打压。

1954年，新加坡殖民政府强制适龄青年服役，当时由于战乱因素，导致华校有许多超龄生，因此“国民服务法案”势必影响在籍超龄生的权益，引起学生抗议。1954年5月13日，学生向总督请求免疫，但在这请愿过程中与警察发生冲突，引发“五一三事件”。此事后来催生了全星华文中学联合会（中学联），其宗旨是保障人权、维护与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争取学习自由民主的生活及发展各民族同学的友谊团结（邱淑玲，2011）。

五一三事件发生时，陈妙华就读中一，才刚入学不久，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局势，所以没有参与。但自五一三事件后，陈妙华成为了中学联的活跃分子，并担任事务部副主任。“我是乡下小孩，连报纸都没看，哪里有什么政治意识，没有的，什么都不懂。可是从这三年里头（按：1954、55、56年），一下子变成积极的学生运动分子。这个过程，是时代造就我们那代人的”（陈妙华，2017）。

当时中学联除了积极搞好学习、争取民族教育的平等待遇、关注社会议题（如工运）外，也开始探讨“马来亚独立”的课题。例如中学联副主席王鹤群就驳斥当时的一种观点，指出：“许多华人之所以不能抛弃中国的观念是由于一种保守或民族优越感在作祟的。他们以为他们是从中国来的，在文化上及生活习惯上，大部分还是和中国人相同，因此，他们应选择中国为他们的国家。这是多么保守呢？如果这样的言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美国人不是应该称他们自己为英国人了吗？……”（王鹤群，1956，页540）

1956年，中学联以观察团身份出席亚非学生会议，陈妙华是团员之一，并担任总务一职。（傅孙民等，2012a）1956年从亚非学生会议回新后，9月24日，当局引用“社团注册法令第十七条”，指中学联违反注册规定，宣布吊销其注册。（傅孙民等，2012b）与此同时，一百多名学生被教育部开除，陈妙华是其中一位被开除的学生。当时人心惶惶，很多学生害怕被政府逮捕而不敢回家，包括陈妙华。无法回家，陈妙华只好轮流到不同朋友家寄宿。正是这时候，她开始自修马来文（陈妙华，1995；陈妙华，2017）。也是在这段期间，她翻译了《刀尖下的生命》（1959），掀开了她翻译生涯的第一页。陈妙华在1960年代出版不少翻译作品，包括《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篇》（1962）、《辜邦岸》（1962）、《竹棍子》（1962）等。从那时起，陈妙华开始投入到推广马来语文的工作，这包括了担任《马来语月刊》主编、从事翻译、创作、编撰词典等。

在编《马来语月刊》期间，陈妙华与杨贵谊密切合作，当时《马来语月刊》中许多定期供稿者，如林清吉、廖建裕等，都是南大圈子的人，因此，可以说，编者的人际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马来语月刊》的部分面貌。

### （三）杨贵谊

杨贵谊生于1931年马来亚柔佛笨镇，自小在乡区长大的，邻居都是马来人，从小对异族文化产生兴趣，想方设法学习马来语。日治时期，杨贵谊被迫辍学，并见证日本人的残酷统治。二战后，杨贵谊到新加坡升学，当时马新两地仍是英殖民地，英国基于冷战的反共战略，切断马新与中国的交通管道，并实行高压统治。杨贵谊在华侨中学念书时，曾因藏了几本中国书而被殖民者逮捕、扣留、软禁。因此，杨贵谊对殖民主义深恨痛觉。虽然他不热衷参与政党政治活动，但积极关心政治发展、民族交流，并透过自修的方式，掌握马来语文知识（杨贵谊，2006）。

南洋大学在1950年代中创办后，杨贵谊成为第一批学生。在南大就学期间，杨贵谊在校内校外开班教授马来文，并从事翻译、编辑等工作。例如出版南大的马来文版学生刊物 *Mimbar Universiti*。1956年，杨贵谊曾以观察团成员身份列席国际学生联合会在印尼万隆举办的“亚洲与非洲大学生会议”。在当时，印尼刚结束独立战争，整个社会还处于独立的氛围中。杨贵谊见到印尼学生高唱〈哈罗，哈罗万隆〉这首富有革命情操的歌曲，深深地被其所感染：“像这样激昂的革命歌曲，当然会激励我们更加坚决争取国家早日独立的冲劲。”（杨贵谊，2006，页167）

从南大毕业后，杨贵谊曾到《南洋商报》担任记者，并于1961年自费前往国立印尼大学深造，修读印尼语文系，同时担任《南洋商报》印尼新闻通讯员。毕业后返新，1960年代初，杨贵谊回到母校南大担任马来文讲师。1960年代中期南大因政治事件面临重组，杨贵谊不获续约，离开校园后开始着手编撰华马词典。

1961年鲁白野去世后，《马来语月刊》辗转由陈妙华接手。在印尼留学期间，杨贵谊除了忙于课业，也不忘寄稿回来，并提供意见；在编务上，两人有着密切的合作。例如在审稿方面，除了陈妙华，杨贵谊也从旁帮忙。杂志中的一些栏目，如“Jawapan Pak Sulit”（一个解答读者疑难的栏目）、“Dari Meja Pengarang”（类似社论功能的栏位，针砭国内语言课题），杨贵谊都有参与。（陈妙华，2017）因此，尽管杨贵谊的名字并未列入编辑名单，但却对《马来语月刊》的编务有重要影响。

#### 四、翻译与华马文库

从以上讨论，可以知道，《马来语月刊》无论就其创刊宗旨或编辑人的理念，都带有很明确的马来亚民族意识。他们主张透过推动马来语的学习，来促进各族群的了解；与此同时，华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语言。这个多语社会图景，成为《马来语月刊》多年努力奋斗的目标。

《马来语月刊》并不局限于提倡学习与使用国语，同时也进行大量的华巫双向翻译的工作。相关稿件，除了由编辑撰稿，也接受读者投稿。从编辑方针来说，主要是鼓励使用外稿。<sup>7</sup> 在征稿要求方面，见以下两则征稿启事：

第20期	第63期
<p>本刊恳切地欢迎各地读者能热烈投稿，稿件之有关范围如下：</p> <p>a) 有关国语之一般论述。</p> <p>b) 简易国语读物（以短小精悍为原则）。</p> <p>c) 有关马来民族风俗习惯的介绍。</p> <p>d) 具有促进与提高国语学习的漫画与木刻等。</p> <p>e) 有关国语书籍与作家介绍与评论的短文。</p>	<p>为了丰富本刊内容及满足读者各方面的需要，我们恳切地向文友们征求下列各类文稿：</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新诗、班顿及沙益尔等。</li> <li>2. 笑话、短篇散文以及简短的讽刺性文章。</li> <li>3. 语文专题讨论，人物介绍及现有各版所采用的类属文章。</li> <li>4. 各地语文活动报道。</li> </ol>

<sup>7</sup> “虽然本刊各样的版位有限，但我们处理稿件的原则是：先考虑外稿；在不抵触本刊内容的要求和水准之下，我们尽可能给外稿发表的机会。即使有不妥当之处，只要修改后不失原作意义，亦不会被当为废稿而抛入于纸篓。”这段话说明其编辑方针以外稿为主，见〈请批评，多赐稿〉（第30期：页42）。

从以上看，来稿不局限于翻译，包括介绍（“有关马来民族风俗习惯的介绍”、“各地语文活动报道”等）、评论文章（“有关国语书籍与作家介绍与评论的短文”、“语文专题讨论”等）。无论如何，本节将集中讨论《马来语月刊》有关文学的译介工作。

《马来语月刊》相当重视翻译，这包括了华译马与马译华这两个方面。该刊物曾在第42期〈编后话〉公布将举办“翻译比赛”（Sayembara Menterjemah），其目的是：一、鼓励读者的学习热情；二、让读者们有机会试一试自己的程度。该次比赛选定了一篇题为“Gandum Di-sangka Emas”的作文，要求参与者把它翻译成华文。除了举办翻译比赛，《马来语月刊》也接受读者的译介稿。在这些稿件中，以文学为例，包括了寓言、典故、现代诗歌（皆是华译马），此外还有马来诗歌、作家介绍、文坛概况（皆是马译华）等。相关译介稿都是以双语方式呈现。

就华译马部分，《马来语月刊》从1960年代初期就开辟“寓言选译”（Cherita2 Ibarat Tionghoa）栏目，刊登读者的来稿。此栏目稿件主要选自庄子、列子、韩非子等著作中的典故，并以华马双语的方式刊登。例如肖坚译的〈岔路 Simpang Jalan〉（选自列子）（第18期）、〈没有用处的本领Kepandaian Yang Tidak Berguna〉（选自庄子）（第19期）、〈朝三暮四 Pagi Tiga Petang Empat〉（选自庄子）（第21期）。其他栏目，如“历史故事”、“名人故事”（Cherita2 Tokoh2 Yang Terkenal）等，则刊登了翁小华译〈中国著名的导师——孔子 Sa-orang Guru Yang Mashhor Di-negeri China-Confucius〉（第41期）、不屈译〈纪昌学箭 Chi Chiang Belajar Memanah〉（第40期）、Mei Lee译〈酒仙李白 Pemabok Lee Pai〉（第45期）

除了把中国经典译成马来文，《马来语月刊》也刊登中国现代诗翻译。例如矢从译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歌唱 Aku Menyanyi Untok Pemuda Pemudi〉（第31期）、矢从译艾青的〈太阳的话 Perchakapan Matahari〉（第36期）。但这方面的量远不如中国典故的译介。

很显然，这一类翻译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峇峇华人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的情况不一样。前者是在国语运动之下的结果，使用的是正在标准化的马来语，而峇峇马来语则是一个缺乏标准化、精致化的语言。因此他们所使用的，虽然同为马来语，在深层面来说，却是不同的马来语，即前者为高等马来语，峇峇马来文则是低等马来语。其次，有论者认为峇峇华人在19世纪末的大规模出版现象，是透过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来创建峇峇华人文化身份（庄华兴，2010）。换言之，这是族群文化再创造的过程。反之，国语运动影响下的华人使用马来语的文化现象，则是一个民族文化创造的过程。最后，1950、60年代马来亚独立时期华人参与的马来文化运动，与19世纪末的峇峇华人文化现象，并没有任何经验上的传承关系。

《马来语月刊》也刊登不少本地马来文坛的译介作品，这些都是马译华的诗歌<sup>8</sup>。例如白浪译的Mukhbir〈你是明灯 Kau-lah Pelita〉（第37期）、Za'ba的〈进步的

时代Zaman Maju> (第40期)、椰人译的Buyung Saleh<我的我Aku-ku> (第45期)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知识”(Medan Sastera)栏目中,对马来作家做了系列的介绍,例如林里译的<阿都拉欣卡斋 Abdul Rahim Kajai> (原作者不详) (第45期)、<荷兰学者眼中的现代马来文学 Kesusasteraan Melayu Moden Dalam Mata Sarjana Belanda> (原刊 Dewan Masyarakat) (第47期)、罗木火译的 Firdaus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作家Pengarang2 Sa-belum Perang Dunia yang Kedua> (第48、49期)。

除了中国与马来文坛,也包括一些国外译作,但这方面数量上更少,这包括了西方文学,例如谷衣译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你的生命完了>(Jiwamu Melayang) (第19期)。其他则是印尼现代诗的译介,如洪浪译 A. Kartahadimaja的<丧失宝石 Kehilangan Mastika> (第38期)、秀娥译 Widada, Purwodadi 的<我的愿望 Chita2ku> (第44期)等。无论如何,这方面的译介工作并不多。

总体上,《马来语月刊》刊登了大量的译介稿件,对于马来语或华语的文化库存的流动与积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若从马华文化主体性角度看,那么《马来语月刊》似乎缺乏马华文学的译介稿。从这点来看,可能说明了几点。首先,这样的取向很可能不是《马来语月刊》编者所能决定的,因为大部分稿件来自于读者。尽管如此,这却也说明一点,当时华社虽然在政治上区别了中国人与马来亚人,并选择以后者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但在文化上,可能还没有(或不觉得有必要)在中国与马来亚华人文化之间建立一个明确的边界。

## 五、新闻与评论：马来文斗士的定位

除了上述提到的文学文化译介,《马来语月刊》从创刊开始,就有意识地耕耘新闻译介。如同文学译介,新闻译介也是以双语并列方式刊登。一方面,固然也是为了透过双语对照方式来促进华裔读者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显然是为了要促进跨语言的信息流通。

《马来语月刊》的“新闻天地”(Warta Berita)栏目<sup>9</sup>刊登的新闻译稿种类繁多,包括国际新闻、社会新闻、语言课题、政治课题。例如<语文:总理要求每日五分钟 Bahasa: P.M. Minta Lima Minit Sa-hari> (第15期)、<东南亚史学家会

<sup>8</sup> 在推广马来文学方面,除了翻译,《马来语月刊》也开辟“马来诗人简介”(Ringkasan Riwayat Penyajak2 Melayu)栏目,以双语并列的方式介绍马苏里S.N. (Masuri S.N.) (洪浪) (第53期)、东革华兰(Tongkat Warrant) (洪浪) (第54期)、沙末·赛益(A.Samad Said) (Hung Lang) (第55期)、哈林安哇(Halim Anwar) (Hung Lang) (第56期)、慕达·雅信(Mokhtar Yasin) (Hung Lang) (第57期)、莎尔美·曼查(Salmi Manja) (Hung Lang) (第58期)、阿明(A.S. Amin) (Hung Lang) (第59期)、耶哈耶M.S. (Yahya M.S.) (Hung Lang) (第60期)等。

<sup>9</sup> 此栏目后来改名“新闻导读”。

议Konferentie Pakar2 Sejarah Tenggara Asia> (第15期)、<狗被人咬Anjing Di-gigit Manusia> (第19期)、<语言：对华校教师联合会的警告 Bahasa: Ingatan Kpd Kesatuan Guru China> (第46期)、<“唯一”官文日期的决定 Putusan Tarikh Bahasa “Tunggal”> (第53期)、<六十五万非马来人学生正在学习国语 650000 Murid Bukan Melayu Kini Belajar Bahasa Kebangsaan> (第54期)等。

此外，自1962年起，增设“时论选译”栏目。根据第20期<编后话>：“自本期起，本刊将会增辟一栏‘时论选译’专事介绍各大报刊之社论。读者们可从它了解马来社会舆论之一斑；如果可能，我们也将介绍华文报社论。”（马来语月刊《马来语月刊》，1962：页42）“时论选译”曾刊的稿，例如周敏译的<拼音——必须解决的问题Ejaan-Masa’lah Yang Perlu Di-selesaikan> (第46期)、敏译的<国语还没被充分应用Bahasa Kebangsaan Belum Chukup Di-gunakan> (第52期)。这两篇“选译”与当时国内的语言政治议题相关。前者批评统一的拼音系统迟迟未能落实，对非马来人学习国语制造诸多不便。后者则批评政府官员忽略国语的发展。

综合以上，新闻译介的范围虽然广泛，但仍可看到《马来语月刊》对语言课题的关怀。除了新闻译介，《马来语月刊》也刊登原创评论文章，当中占大部分由编者自己撰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第35期开始刊登以马来文撰写的“编者的话”（以Dari Meja Pengarang或Pengarang的栏名出现）。起初该栏目不固定，至第43期开始才定期出现。这栏目之所以值得注意有两点。首先，相对于其他栏目以双语呈现，此栏目文章几乎只有单一的马来文。其次，其内容是针砭马、新两国在国语运动之各种不足处，所抨击的对象包括马来人知识分子、政府机关单位、国家语文局等，因此发挥“施压”或“监督”的舆论功能。相关评论文章既然以“编者的话”发表，即表明其所代表的是《马来语月刊》的正式立场，所发挥的舆论功能类似于一份报刊的“社论”。下文将分析相关评论文章。

大体上，《马来语月刊》关注的语言议题，包括“马来西亚与印尼统一拼音法”、“马来文教育”、“1967国语法案”等。

就“马来西亚与印尼统一拼音法”方面。由于曾经分属不同殖民地，荷属印尼与英属马来亚的马来语虽然同源，却有不同的拼写系统。这导致两地人民无法在语言知识方面，享有共同的商业与文化市场带来的好处，如两地书籍的流通。为了促进马印语言领域的大一统，两国曾于1950年代末达成统一拼音法协议，但后来却没有执行。1960年代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共组马来西亚，印尼政府认为这会破坏其在本区域的利益，从而引发“马印对抗”（Konfrontasi）事件。马印统一拼音法因此政治事件而被搁置多年。然而，无法统一拼音法也意味着可能对国语发展带来不利。因此，《马来语月刊》早在第25期开始，就表达其对马印统一拼音的支持与期待。例如刊登Y.Omaf的<印尼采用Melindo拼音法> (第25期)。往后又透过“编者的话”栏目，发表“Harga Penerbitan Bahasa Melayu” (第47期)、“Singapura Akan Mengambil Sistem Ejaan Yang Tersendiri?” (第62期)、“Pelaksanaan Ejaan Malindo Sedang Di-tunggu2” (第65期)、“Segerakan

Ejaan Yang Bersistematik”（第72期）、“Zaman Perbahasan Harus Di-tinggalkan!”（第80期）、“Pelaksanaan Ejaan Bersama Di-tundakan Lagi? Pengarang”（第82期）、“Penting, Penting, Penting Sahaja Ta’Guna”（第97期）等文。相关文章观点主要是催促有关当局放弃歧见、务必避免两国拼音法被分裂的后果、不要只议论不实践等。

《马来语月刊》也相当关注“马来文教育”，发表若干文章，如“Kelas2 Persiapan Universiti”（第48期）、“Demi Kepentingan Pelajaran Nasional”（第58期），期待政府成立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大学；“Bila Jurusan Bahasa Melayu Akan Diadakan Di Nantah?”（第57期）、“Mudah2an Jangan Berupa Bunyi Tong Kosong Lagi”（第83期），对南洋大学成立马来文系的期许，以及因其久久未能落实而提出批评；“Sikap Tegas Kerajaan Terhadap Bahasa Kebangsaan Di-kehendaki”（第77期）、“Untok Kefaedahan Anak2 Kita?”（第89期），批评部分马来教师或官员主张应以英语教数理的立场。

《马来语月刊》不仅批评“英语至上”的支持者，对于掌握实权却没有好好发展、推广国语的官方机构，如国家语文局，也做出犀利的批评。在第一任国家语文局总监 Syed Nasir 宣布离任，并由 Ali Haji Ahad 接手后，《马来语月刊》一连三期发表文章，即“Harapan Kita Telah Di-arah Ka-masa Depan”（第93期）、“Chakap ‘Lengkap’ Lagi”（第94期）和“Pegawai Baru Tugas Baru”（第95期），虽然不至于全盘否定 Syed Nasir 的贡献，却也对他在发展、推广国语方面之不足处做出批评，如无法在任期内实现出版马来语大辞典的目标。

另外，《马来语月刊》也针对《1967国语法案》发表若干文章，如“Memang Sudah Pada Tempat-nya”（第53期）、“Selamat Tahun Baru”（第70期）、“Menjelang 1 September”（第78期），相关文章主要是提醒读者1967年即将到来，届时“马来语作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法令将落实，因此呼吁读者应该要好好学习、使用国语。如前所述，对照1960年代中期由沈慕羽领导的“华语官化运动”其中一个主要诉求就是反对“马来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马来语月刊》则采用了一个迥异于主流华社的立场。

纵观以上的各种议题，基本上都跟国语的地位规划与本体规划有直接关系。例如“1967国语法案”关系到马来文作为唯一官方语文地位规划的实现。“马来文教育”、“马来西亚与印尼统一拼音法”则关系到马来文的本体建设（语法、拼音、词库等）。而国语的“地位”和“本体”之规划和建设，最终都会影响到国语运动之成败。根据以上，我们可以把《马来语月刊》这份刊物定位为“马来文斗士”（Pejuang Bahasa Melayu），因为它不仅仅是被动地响应国家的号召，相反地，它有着自己的民族理念，以发扬国语为己任，从而对一切会破坏国语发展的因素进行批评。因此，相对于其他许多人是因为顺着大趋势而投入国语运动的工作，并在运动走势疲弱时而离队。《马来语月刊》不是局势的产物，而是尝试创造局势的刊物。这是本文将其定位为“马来文斗士”之原因。

## 六、总结

马来亚和新加坡华社的学习国语运动，自1950年代起，随着马来亚独立、新加坡自治与马来西亚成立，而达到高峰。彼时在政府由上而下推动，民间由下而上呼应下，形成了一股学习的风潮。然而，自1965年起，整个大环境出现了变化。该年马新分家，独立后新加坡虽然还维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但在1967年后开始转向英语化政策（郭振羽1996）。马来语失去了国语的实质地位，重要性被英语取代。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则因为日益复杂的族群政治、语言政治因素，导致华人与马来人处于紧张关系中：“马来语作为国语”尽管在官方政策中持续执行，却无法赢得华人的认同，即当初华社学习国语运动的盛况不再。这也意味着《马来语月刊》很可能在此时开始陷入营运困难。

也正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马来语月刊》“编者的话”自1968年起，发表了几篇评论，谈及此现象。“Ka-mana-kah Golongan ‘Tua’?”（第84期），提到早年热心参与推广马来语的华人专家，现在都销声匿迹了。“Siapa Yang Mesti Bertanggung-jawab?”（第86期）则提起国语发展陷入停滞乃至后退的状况，并批评一些过去热衷于推广国语的人士如今已经转换跑道。这一切都已经说明，大环境的改变，不利于华社国语运动的持续。

1970年4月，《马来语月刊》第110期宣布停刊，在〈停刊启事〉中指出：

我们出版的宗旨是：马来语已是国语，鼓励学习，是每一位国民应有的义务，所以毅然负起这一任务，抛砖引玉稍尽职责而已，可是，十年来的销路，一直不能打开，学校订购也不热烈，由于教育政策演变的结果，这一本以华文作为媒介的刊物，销行上遭受到的压力是可以想像到的，因此我们决定自110期出版后，暂时停刊，我们希望在适当的时期，能有复刊的机会，并请原谅。

（《马来语月刊》，1970，封面内页）

一如大部分的刊物，“暂时停刊”往往意味着“永久停刊”。《马来语月刊》，作为华社学习国语运动时期一道独特风景，也在第110期画上了句号。

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来语月刊》在华社学习国语运动中的意义？

从《马来语月刊》的文学/文化译介工作看，尽管有着明确的政治上的边界意识（认同马来亚人身份），在牵涉到中国马来亚华人之文化边界方面，却似乎还带有模糊不清状况。当然，在此并非要下价值判断，即认为在文化译介方面必须要有“本土优先”意识。而仅仅在客观层面指出，文化层面上，《马来语月刊》的投稿者，似乎还未（或觉得不需要）厘清中国文化与马华文化之边界。譬如，他们会认同马华文学有主体性，而非中国文学的支流吗？

另一方面，本文以“马来文斗士”，而非“国语运动参与者”定位之，其

根据在于，从《马来语月刊》这十一年的出版来看，它不仅仅被动地响应国家的号召，而是有着自己的民族使命感、明确的多语社会图像与自主意识。这方面的政治意识，其实与编辑人（知识分子）生命历程息息相关。比方说，杨贵谊深受印尼革命情操感染，陈妙华在中学时期的反殖民学生运动经验，鲁白野和杨贵谊在印尼接受高层次的印尼文化熏染，开拓文化视野等等，促使他们成为坚定的、认同于马来语的马来亚民族主义者。也因此，《马来语月刊》尽管在后期艰难营运，却仍然坚持下去。此外，《马来语月刊》并不是在毫无方向的情况下推广国语，反之有着自己批判的视角。就以上而言，无疑可视之为“马来文斗士”。

## 参考资料

### 中文资料:

- 陈妙华（译）（1995）。前言，*马来短篇小说选：河上风云*，新加坡：最爱出版发行服务社，页XIII-XVI。
- 傅孙民等（主编）（2012a）。中学联出席亚非学生会议观察团团员介绍，*英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学生运动珍贵史料选：1945年9月-1956年10月*，新加坡：草根书室，页554-55。
- 傅孙民等（主编）（2012b）。政府强硬措施：昨宣布解散中学联，*英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学生运动珍贵史料选：1945年9月-1956年10月*，新加坡：草根书室，页614-17。
- 郭振羽（1996）。语言政策和语言计划。云惟利（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页57-74。
- 韩山元等（主编）（2005a）。世界书局对马来语文的贡献，*诗书滋味长——大众集团八十周年特刊*，新加坡：大众控股，页124-127。
- 韩山元等（主编）（2005b）。意外当主编：《马来语月刊》忆旧，*诗书滋味长——大众集团八十周年特刊*，新加坡：大众控股，页128-130。
- 黄慧敏（2004）。*新马峇峇文学的研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硕士论文。
- 鲁白野（1953）。*狮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马来散记续集*（1954），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实用马华英大辞典*（1959），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马来语月刊*，1（1960）。吉隆坡：马来文化促进机构。
- 马来语月刊*，20（1962）。吉隆坡：马来文化促进机构。
- 马来语月刊*，55（1964）。吉隆坡：马来文化促进机构。
- 马来语月刊*，110（1970）。吉隆坡：马来文化促进机构。
- 马来亚联合邦宪法*（1958）。吉隆坡：艺华出版社。
- 南洋商报（1969）。*新加坡一百五十年*，新加坡：南洋商报。

邱淑玲（2011）。一九五零、六零年代新加坡华校学生运动的交替与延续——从“中学联”到南大学生会。陈仁贵等（编），*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八打灵再也：策略资讯研究中心，页84-98。

文平强（主编）（2008）。殖民主义、新文化、民族国家：马来（西）亚华裔作家与现代马来语文与文学，*马来西亚华人与国族建构：从独立前到独立后五十年*，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页561-583。

王鹤群（2012）。我们应选择马来亚为我们的国家。傅孙民等（编），*英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学生运动珍贵史料选：1945年9月-1956年10月*，新加坡：草根书室，页538-542。

吴小保（2016）。冷战与马来亚左翼（反）国语运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8-19期合刊，页121-152。

杨贵谊（2000）。新马华社与马来语文现况。李如龙（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页33-47。

*杨贵谊回忆录：胶童与词典*（2006）。吉隆坡：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华马文化论丛*（2014）。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庄华兴（2004）。南大学人与马来语文发展：廖裕芳和杨贵谊的贡献。李业霖（编），*南洋大学史论集*，吉隆坡：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页239-67。

郑良树（2003）。*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四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 马来文资料：

Hussain, A. (1984). *Sebuah Perjalana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 访谈：

陈妙华（2017年6月16日）。新加坡：陈妙华住家。